

政府新闻学译丛

主 编：叶 皓 方延明

草根媒体

WE THE MEDIA

【美】丹·吉摩尔 著

Dan Gillmor

陈建勋 译



O'REILLY

南京大学出版社

政府新闻学译丛

主 编：叶 皓 方延明

草根媒体

WE THE MEDIA

【美】丹·吉摩尔 著

Dan Gillmor

陈建勋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草根媒体/(美)吉摩尔著;陈建勋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3

(政府新闻学译丛)

ISBN 978 - 7 - 305 - 06555 - 2

I. 草… II. ①吉…②陈… III. 因特网—影响—新闻工作—研究 IV. G206. 2 G2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6836 号

We the media

by Dan Gillmor

© 2006 by O'Reilly Media,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which is the authorized translation of the English edition, 2006 O'Reilly Media, Inc.,
the owner of all rights to publish and sell the same.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 - 2009 - 015 号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出版人 左 健

书名 草根媒体

作者 (美)丹·吉摩尔

译者 陈建勋

责任编辑 王其平

照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刷 南京大学印刷厂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5 字数 377 千

版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978 - 7 - 305 - 06555 - 2

定 价 38.00 元

发行热线 025 - 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政府新闻学译丛》

编 委 会

主 编：叶 翱 方延明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卜 宇 方延明 左 健 叶 翱

李希光 吴锦才 陈昌凤 胡智峰

段京肃 曹劲松

新闻自由只限拥有出版机构的人拥有。

——A. J. Liebling

如果你不喜欢那些新闻……起来行动，做自己的新闻。

——Wes“Scoop”Nisker

《政府新闻学译丛》总序

叶 磊

现代社会，媒体潜移默化地根植于人们的生活和世界的每个角落，在反映世界的同时又在塑造世界。媒体的地位日益提升，政府与媒体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社会管理的各个领域都需要借助媒体，这在全世界都成为一种趋势，并且这种趋势还将随着媒体的发展不断得到深化。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媒体事件，折射出政府应对媒体方面还存在很多薄弱环节。提高政府的媒介素养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现实课题。但以往国内的各个学科中，公共关系学从社会组织、企业的角度来研究应对媒体、开展公关的技巧；新闻学与传媒产业联系紧密，定位于新闻专业人员的培养；传播学主要研究传播的概念、理论、方法，以及不同的传播领域、传播行为。它们都没有站在政府的角度，专门针对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开展研究。我们在国内首先提出建立政府新闻学学科，就是为了填补这一空白，以超越传统学科的视野，去研究中国政治生活领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相比较而言，西方国家新闻传播业发达，政府与媒体的博弈有着长久的历史，在政府应对媒体领域的实践与研究都远远走在我前面。

在实践方面，正确掌握与媒体打交道的方法和技能，已经成为西方各国政府官员从事公共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素养。正如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所言：我们今天的大部分工作量，不管是按重要程度计，按时间计，按精力计，除了最核心的决策之外，其他几乎都是在和媒体打交道。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与媒体的不断博弈中，逐渐掌握娴熟的操控媒体的方法，形成一套应对媒体的机制。美国政府官员普遍具有强烈的媒体意识，将媒体作为政治营销、新闻执政、对外扩张的重要工具，时刻防范受到媒体的攻击。他们吸收传播学研究成果，运用拟态环境、议程设置和框架分析等专业理论，指

2 草根媒体

导与媒体打交道的活动；建立专门传播机构，包括美国新闻署等管理部门和美国之音等媒体，处理媒体事务，操控新闻报道；借助传媒专业力量，雇用公关、广告等专业人员和公关公司，开展各种政府公关活动；采取各种专业手段，包括聘请枪手、故意泄密、制造新闻、公关媒体、民意测验、政治施压，让媒体和记者成为自己的工具。

在理论研究方面，学者尼模和可斯指出：“很少人是从亲身经验认识政治的。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政治现实是经过大众传媒及群体传播的中介而出现。”因此，政治与媒体的关系很早就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由此产生的政治传播研究，在美、英等国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美国为代表的政治传播学研究主要关注政治传播的效果和行为，研究政治对传播的控制与影响；欧洲的批判传播学者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展大众媒介政治经济学批判。目前，美英不少大学新闻学院已开设政治传播学博士专业，有的大学还设有政治传播学研究中心。

面对信息公开的要求和全球传播的大背景，我国政府亟待提高应对媒体、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特别是要在国际传播中通过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树立自己的国际形象。为此，借鉴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是必不可少的。《政府新闻学译丛》的编辑出版，正是要通过翻译、引进国外优秀研究成果，为读者提供全新的观察视角和研究思路。所选著述，基本上都是在国外已广为流传，受到公众好评的佳作。虽然西方学者的研究采用的是经验主义的和实证的、定性的和批判的研究方法，是在一定的政治体制框架内进行的，不能涵盖政府应对媒体的各个领域、各种情况，但我们相信，这些他山之石，一定能帮助我们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和胸襟，去建设一个民主、文明、富强、和谐的中国社会。

序

有时候人们冻结了某些片刻。每种文化都有让时间冻结的重大事件和人物，其重要性超过川流不息的一般新闻。

例如，某个年龄层的美国人得知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 Roosevelt)死讯时，犹记得自己身在何处、正在做何事。另一个世代的人对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被刺身亡之事记忆犹新。每个比2001年9月11日出生的婴儿年纪大的人，永远忘不掉飞机冲撞摩天大楼引发爆炸的景象和传闻。

1945年时，民众围聚在收音机旁聆听即时新闻，待在收音机旁收听罗斯福总统的死讯以及继任人选的后续消息。报纸多印了几版，接下来的几天和几周，在专栏里充满了细节资讯。杂志不再报导重大新闻，而是提供其观点。

1963年也发生过类似事情，但使用的媒介更为新颖，肯尼迪死讯的即时新闻多数透过电视转播。当CBS的权威新闻主播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戴上眼镜，看着达拉斯市传来的消息时，眼中泛着泪水，告诉他的观众，他们的领袖已身亡；我的年纪已大到难以忘却这令人心碎的一刻。就跟之前一样，报纸和杂志都没完没了地加上细节和来龙去脉。

9·11事件也遵循着雷同而恐怖的模式。我们不断“看”着这个可怕的事件。新闻消费者从电视网播出的可怕一幕，得知了“什么事件(what)”——恐怖攻击事件。然后，当印刷新闻媒体以及有主见的播报员不仅止于单纯地报导，而开始深入讨论9·11事件时，我们也得知事件“如何(how)”发生及“为什么(why)”发生。记者们展现出极为优秀的工作品质，让我很自豪能身为其中一分子。

但是，还有一件事，一件很重要的事也差不多同时发生：新闻由普通民众生产出来，他们想发言、想自我表现；新闻不再只由“正式”的新闻机构提

供——传统上,新闻机构才是决定历史最初面貌的发言人。这一次,为历史添上新色彩的执笔人,却有一部分是传统的阅听大众。这是可能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互联网上有新兴的出版工具。

在 9·11 事件后令人胆寒的时日里,浮显出另一种报导形式。透过电子邮件、邮件论坛、聊天室、个人网站日志(都不是标准新闻来源),我们接收到美国主流媒体无法提供,也不会提供的珍贵的事件起源。

我们见证了新闻的未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未来新闻的一分子。

六个月之后,又有另一种未来新闻的示范。这一次代价不大,只是某位权倾一时的董事长感到有点不愉快而已。2002 年 3 月 26 日,可怜的乔·纳齐奥(Joe Nacchia)第一次尝到了未来的滋味;而这一次,我个人也在搭建明日新闻展示台的布景上帮了点小忙。

事实上,纳齐奥出现在 PC 论坛研讨会(PC Forum)时,他正赚进大把钞票;这个研讨会在凤凰城郊区举办,以董事长为主。而纳齐奥当时似乎沉浸在自怜自艾之中。

那时候,纳齐奥是地区电信巨头奎斯特(Qwest)的董事长;这家公司跨州市场上几近独占。在 PC 论坛的聚会上,他抱怨筹资很困难。想象一下:独占企业的董事长抱怨经营独占事业的困难,更何况纳齐奥自己的管理方式也与他所面临的困境息息相关。

我是听众之一,利用大会为与会者准备的无线通讯设备,把数次会议结果发布到我的博客上(weblog,博客,是在线日志,以短文的形式贴在网站上),很接近即时报导。此外,还有另一名博客记者多克·瑟尔斯(Doc Searls),他是软件杂志《Linux 记事》的资深编辑。

我们压根儿不知道那天早上的新闻会变成商业界中的小传奇。我也压根儿不知道这段经验会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从事新闻的技巧正在改变。

我的其中一篇报导提到纳齐奥的抱怨,文中提到他愈来愈有钱,但公司的市价却在降低;这是 CEO 身价暴涨,而由股东、员工和大众买单的另一实例。没多久,我收到一封来自布兹·布吕热曼(Buzz Bruggeman)的电子邮件,他是佛罗里达州的律师,从位在奥兰多市的办公室里固定浏览我和瑟尔斯的博客。布吕热曼语带讽刺地写道:“美国是不是很了不起?”随信附上一个超链接,指向雅虎财经网页,显示纳齐奥从股市中赚了超过 20 亿美金,而奎斯特的股价却一片惨绿。这项资讯使我十分震惊,因为和我的文章有关,于是我立刻把这则有料的报导丢到博客上,并用网络的方式向布吕热曼致敬。(我附带写道:“布兹,多谢提供链接。”)多克·瑟尔斯也差不多是这样。

埃丝特·戴森(Esther Dyson)的公司 Edventure Holdings 主办那场会议^①,她写道:“当时,听众变得很不友善。”多克和我是否成为这一幕的推手?显然如此。许多待在豪华旅馆大厅的人,那天早上也有上线的(也许一半是董事长、金融家、企业家,以及记者),至少,他们某些人也觉得多克和我写的东西很有趣。在纳齐奥后来的讲座中,可以感觉到会场对他冷眼相看。戴森是投资客也是作家,她后来提到我们的博客绝对与会场弥漫着寒气有关^②。她把博客称为“附加会议,随时举行,进而渗透主要会议”。

我为什么要说这件事?再怎么说,这也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然而,对我而言,这是个转捩点。

想一想新闻流动的过程:反馈回路始于亚利桑那州凤凰城举办的一次会议,迅速传到佛罗尼达州奥兰多市,再回到亚利桑那,最后传遍全世界。在这个拥有卫星通讯和光纤的世界里,即时新闻是很平常的事,但是,记者群多了具备专业知识的阅听大众。

这些力量让每个牵涉其中的人都学到了经验,包括“新闻制造者”(纳齐奥),这类人每天都在刀口上应付来自记者的压力,有时甚至是带着敌意的压力。揭露纳齐奥的自大并未使他丢掉工作——尽管他最后还是因为不胜任 CEO 的职务而下台,但是,当天早上他小尝了未来新闻业苦涩的一面。

我相信,从这段经验中深刻理解未来新闻的人不是专业记者,也不是新闻制造者,而是布吕热曼。早期,在科技尚未粗暴地冲击新闻业之前,他只是阅听大众的一员。现在,他不需要等待传统的报章杂志,甚至是网站媒体的报导,就能接收新闻事件。现在,他自己就是新闻工作过程中的一部分,是一位平民记者,其专业知识和敏捷的思绪,让我得以即时写下我的新闻。

布吕热曼不再只是消费者了,他也是生产者,他在做新闻。

本书谈的是新闻业的转变,从 20 世纪的大众媒体结构,转变成某种更有

① 埃丝特·戴森有关纳齐奥插曲的专栏可见 <http://www.edventure.com/conversation/article.cfm?Counter=8648145>。

② 相信纳齐奥自己就有完美的能力可以自行惹恼听众。克莱·舍基(Clay Shirky)当天也在现场,他也觉得气氛不太一样,不过一直闷到有人帮他指出旁边电脑上的博客时才恍然大悟。他告诉我说:“正常情况下,像这样的博客大概需要一天时间才会往外扩散,但是,因为这里的人都与网络息息相关,而且老实说,纳齐奥的发言实在无聊。很多人都在他说话时读博客,即使没在读的人附近也有人在看博客。所以整件事从发现、发表再到散布的过程相当紧凑,基本上就在他上台讲话的时间内发生。”

草根意味和深化民主的东西。首先，这本书是个关于进化的故事。人类喜欢说故事，每个新时代的进步总是会产生层出不穷的故事。

然而，这本书同时也是当代革命的故事，因为科技给了我们沟通工具，可以让任何人以极少花费就成为记者，在理论上，甚至是国际新闻记者。这种事情在以往是不可能的。

20世纪时，新闻几乎是记者、记者报导的人物（或说新闻制造者）、操弄大众的公关和市场营销人员掌中的玩物。出版和广播所需的经济规模创造了巨大、傲慢的组织机构，名叫媒体集团（Big Media，也有人称为大媒体），就连地方性的报纸和广播电视台也透露了某些这种现象的恶劣征兆。

无论如何，媒体集团把新闻视为演说；我们媒体告诉你新闻是什么。聆听大众要么掏钱购买，要不然就拉倒。你也许会写信给我们，我们也许会刊载。（如果我们是电视，你也许会抱怨，但除非抱怨是专打诽谤官司的律师信件，否则我们理都不理你。）不然，你可以不要订报章杂志，或者不要看我们的节目。这个世界滋养我们这种人的自满和傲慢，我们乘坐在装满民脂民膏的列车上，虽然它还撑得住，但却不可能永盛不衰。

未来的新闻报导和生产会比较像对话或讨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界线将会模糊，以我们现在才逐渐认清的方式改变两者的角色。通讯网络本身就是人人发声的媒体，不再只属于少数有财力花好几百万美元购买印刷媒体版面、发射卫星，或获得政府许可占据公众电波频道的人。

这种演化会迫使各式各样的利益团体开始适应（从演说式新闻变成对话或讨论式新闻）。人人都必须改变他们的做法，包括记者、新闻制造者、消息来源，以及传统阅听大众。另外一种做法只剩下因循旧习。

我们不能再供给传统式新闻。我们不能再将新闻视为由大型组织机构控制的商品。身为社会的一分子，我们不能再忍受有限的选择。甚至在财力上我们也无法支撑，因为华尔街股市对媒体集团的要求，让新闻产品本身的价值跌到谷底。

这个人人都能做新闻的世界主要由三类人员构成。过去曾壁垒分明，但现在三者间的界线已很模糊。

记者

我们会了解我们是某种新兴事物的一部分，我们的阅听大众都变成这个过程的一部分。例如，我把读者比我知道的还多这件事视为理所当然；对新闻工作而言，这是一种解放，不是威胁。所

有筋疲力尽的记者都应该接纳这一点。我们要利用草根新闻业的工具,不然就得走入历史。包括精准与公正客观等记者的核心价值依然重要,在某些方面,我们还是新闻的守门人,但我们塑造大型的对话与提供来龙去脉的能力,至少会变得与收集并报导事实的能力一样重要。

新闻制造者

v

有钱有权的人会让人发现新弱点,纳齐奥就学到了教训。再者,当人人都可做记者时,某些能力够的人会去尝试,他们也会找到专业记者漏掉的东西;政客和企业人士每天都在经历这些。但是,新闻制造者也有新的信息传递方式:利用和草根新闻业所用的相同科技。霍华德·迪安(Howard Dean)在民主党内总统初选时失败,但是他采用的方式会受众人研究及仿效,因为他竞选的方式用了新工具,使其支持者得以参与对话。通讯网络和社会网络的边际成员会成为新闻制造者最严厉、最有效的批评家;但他们也可以是最热情、最有价值的同盟,彼此提供观点,也让新闻制造者耳听八方。

传统阅听大众

阅听大众以往只是新闻消费者,正在学习怎么做出更好、更及时的报导。他们也在学习如何参与新闻制作过程,协助我们建立大型对话,有时候,他们做的比专业记者更好。例如,格伦·雷诺兹(Glenn Reynolds)不仅仅是最受欢迎的博客人之一,在这个过程中,他也累积了相当大的影响力。某些草根记者(grassroots journalist)也会变成专业记者。到了最后,我们会有更多的声音,以及更多的选择。

我身为专业新闻工作者已将近 25 年了。我很感激我所有过的各种机会,以及我所拥有的地位。我尊敬且欣赏我的同事,我也认为媒体集团在很多方面都做了杰出的工作。但是,我绝对肯定,新闻业的现代结构促成了危险的保守主义(商业考量重于政治考量,不过两者的影响都很明显),威胁到我们的未来。对改变的抗拒,有些是财政因素的考量,已经伤害到我们从事的新闻工作,让我们几乎看不见未来的实境。

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今日占有主导地位的新闻企业,为了短期

利益而挤压品质。这种堕落行径,最终可能会埋葬我们自己。

媒体集团享有高额毛利。在准独占市场中,日报通常有 25%—30% 或更高的利润。区域电视台的利润可直飙 50%。然而,对华尔街而言,再多的利润都不够,隔年的获利要更高就对了。这种情况导致了空洞化现象(hollowing-out syndrome):报社和电台经理知道他们可以暂时削减新闻的质量,让获利提升。众多案例之中,华尔街的要求以及投资客的贪婪,让新闻业中的“公众信赖感”(public trust)丧失殆尽。我不相信保障记者查访与报导自由余地的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设计时,立案者的心里头都想着企业利益。虽然我们还没有全然变为犬儒企业(不值得信任的行业),但那趋势是很吓人的。

vi 合并更令人烦忧。媒体公司都在合并,建立更大型的资讯及娱乐混合体。有太多的例子显示出,严肃的新闻以及公众信赖感都陆续被牺牲。这些让新闻业出现破洞,而新兴的记者正在填补这个缺口,尤其是平民记者。

同时,即使贪婪及合并让他们吸饱了金钱,过去的高获利也正遭遇各方的竞争。以报纸的两个主要获利来源为例说明。到目前为止,比较小的获利来源是发行量:读者付钱订报,或在报摊上买。比较大的获利来源是广告,有求才分类广告和零售商品展示广告。但是,这类广告的获利来源都受到其他竞争者的袭击,例如,eBay 和 Craigslist(旧金山的在线社群兼各种杂七杂八列表网站);这些公司的利润低,还是活得很开心,也不在乎新闻业说什么(但是,以 eBay 的例子而言,这是全球最大的分类广告网站,创立了一种新兴的垄断事业)。

长期来看,我可以轻易想到这套商业模式的崩解,尽管它提供我丰厚的报酬,尽管它在企业决策小组的贪婪影响下,十分可敬地努力为公众提供重大的服务。如果这样的商业模式崩塌,没有了雄厚资金,没有了揭丑后对抗强势利益团体迫害所需的昂贵律师费用,谁还会去做专题调查报导?没有了强而有力的出版事业,有谁会揭发水门案(Watergate)?特别是《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凯瑟琳·格雷厄姆(Katharine Graham),她有财力,有道德坚持,经得起尼克松总统及其追随者的压力。在比较普通的层次上,谁能替社区或地区发出主要声音?无论这种发声渠道是做得好或做得坏。尽管我们身处的新闻业不够完美,但是,新闻若陷入混乱无主状态,可不是我想象中的解决办法。

若这个世界的新闻陷入混乱无主状态,将是一个由好几种力量合作摧毁一个广大而可信的言论渠道的世界;那些力量包括我刚才提到的财务压力。要让新闻机构能确实作为服务大众的事业,根本没有商业模式可言,无

论面临什么难题。可信度很重要。大众需要、也想要可以信赖的新闻来源——通常来自认真的记者。如果新闻组织不与严苛的阅听大众携手赢得生存竞争,我们看到的新闻将是难以尽数的宣传文稿,我们只能退回到那个站在肥皂箱上大发议论的年代。我们,需要更好的媒介。

所幸,混乱无主的状态我认为不太可能,部分原因是因为可靠新闻和来龙去脉总有一定的需求。虽然我希望不要成真,但是,资讯封锁的世界也有发生的可能。集权力量面对有人挑战他们的权威时,不会默不作声、毫无所动。

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见证娱乐业和政府两者间邪恶的联盟——我称之为“著作权垄断结盟”(copyright cartel)。政府很难放任资讯自由流通,只容忍到某个程度。用来防止侵犯著作权的合法取缔及技术手段,总有一天会让我们需要获得许可才能出版,或者出版可能违禁的言论时会觉得风险太高。垄断结盟的打击对象是未来新闻业中某些重要的创新之举,诸如点对点文件共享(P2P);这种技术虽然让侵权行为更易发生,但是,也给了平民记者唯一一种散布自制新闻、经济上又负担得起的方式。政府坚持有权记下我们所做的每件事,但是,愈来愈多的政客和官僚却关闭大众需知的资讯渠道;这些资讯透过非传统媒体的努力,却也逐渐浮出台面。

简言之,我们不能单纯假设网络各处的个人出版(self-publishing,我们极度需要的草根新闻业)会生存下去,更别提繁荣。我们需要保卫草根新闻,就跟保卫其他自由权的魄力一样。

取代新闻的混乱无主或过度封锁,我想寻求同时保留当今体系的精华,并促进未来新兴、自发性新闻业发展的平衡状态。我希望能在书中形成的共识是,新闻业的改变不仅仅是必要,或许也无可避免,不过,对我们所有人而言都是切实可行的。

但是对普遍为媒体集团忽略的群众而言,未来新闻不会立刻实现。今天,大多数的平民新闻业(citizen journalism)仍是一小撮人的领域,我的朋友,前报纸编辑汤姆·斯蒂茨(Tom Stites)称这群人为“一群数量极少但极有权力的人——一群受过高等教育,足以参与网络对谈的人;一群具备技能,时间和装备也够充裕的人”。但那些受忽略的人正是我们的“美好新经济”中所遗忘的人。他们是寻常百姓,受到改变的摆布,却不在对话之中。我们新闻业之所以不再受到信赖,是因为我们没有做好聆听大众的本分。

平民记者的兴起有助于我们倾听。谁都有做新闻的能力,可以让沉默的大众发出新声,他们说的话正是我们需要聆听的。他们对我们(平民、记者、新闻制造者)展示出的是交谈和学习的新方式。

最后,他们也许激发了真正资讯充足的公民观念的复兴,但现在这种观念被视为威胁。自治/民治有很多需求,但如果我们做得对,所有人都会因此受益。

为了大众的福祉,让我们开始对话吧。

目 录

第 1 章 鉴往知来	1
第 2 章 读写双向资讯网	18
第 3 章 门槛下降	33
第 4 章 新闻制造者扭转形势	49
第 5 章 人民的同意权	66
第 6 章 专业记者参与对话	83
第 7 章 传统阅听大众参与盛会	103
第 8 章 下一步	120
第 9 章 轮吠、抬轿以及信赖的界限	132
第 10 章 司法上堂(还有律师)	145
第 11 章 帝国大反击	159
第 12 章 做我们自己的新闻	179
后记及志谢	183
网站列表	190
词汇表	196
索引	198

第1章

鉴往知来

9·11事件后，新闻业进入新时代的态势愈来愈清楚，但这非从可怕的¹那一天开始；它出现时尚未成形，也不是凭空诞生。接下来要谈的不算是新闻业的历史，只是带有个人观点的观察纪实而已，这样有助于说明我们厚颜称为“新兴媒体”(new media)的演进历程。

我几乎只谈美国经验，这样做的风险就是把其他国家的贡献忽略掉。美国立国之初，明言不立国教，这点相当重要。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有很多方面的内容，其中包括抗议权利和宗教自由，但是，言论自由是自由社会最为根本的基石。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的名言是：如果要在报纸和政府间做选择，他宁愿选报纸。他贵为总统，被当时舆论攻击，依然坚信新闻业对社会的重要性，因为他厌恶一片歌功颂德之声。

个人新闻业也不是新发明。早在美国建立前，人们就有搬弄事非的本事。美国早期历史中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Ben Franklin)，他发行的《宾夕法尼亚公报》(*Pennsylvania Gazette*)以公益为主，但偶尔还是带有争议性。

还有独立刊物，在第一修正案立法前，新闻舆论自由尚未受到保障，但有些人还是冒着极大的风险自费出版。今日，很少有美国人能了解这点，但世界各地还是有记者因其报导内容而遭杀害。

18世纪晚期，独立刊物作者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运用高明的写作技巧，唤醒众人对叛变(起义)、自由和政府的深思。潘恩不是第一个拿笔写作、冀望众人了解何谓常识的人，也没有试着说服大众接受他认同的常识。也许，更重要的是(当年)匿名的《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的作者群；他们的文章分析了宪法提案，探讨新成立之共和国应该如何运作的基本问题。历史明镜，足以鉴往知来。没有他们，各州不会同意这套宪法；